

英美棉花定价分析及其影响

——新经济史学的视角

孙泽生^{1,2}

(1.浙江科技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杭州 310023;2.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杭州 310027)

摘要: 棉花作为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所仰赖进口的最重要商品以及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其贸易定价以及对定价权的争夺对英美政治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利用计量方法对19世纪英美棉花定价博弈的研究发现,英国借助于殖民地棉花的替代性供给而非航运业的垄断,在与美国的定价权争夺中居于明显的优势,而美国居于劣势的主要原因在于产量控制上的困难。这种定价结果既是英美政治经济政策的必然产物,也是英美政治经济政策演变的最重要推动力。

关键词: 英美棉花贸易;定价博弈;政治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 F729;K5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09)01-0050-07

Anglo-American pricing game of cotton trade and its influences

SUN Ze-sheng^{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Price-setting of cotton trad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price-setting power wa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Anglo Amer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y evolvement because of the cotton's position as the most important raw material relied on import for UK and as the chief exports of USA in 19th century. Research proves that it is the alternative supply of British colonies but not the monopolistic power in shipping industry that provide UK with considerable price-setting advantage over US by econometric method, while American disadvantage originated from its disability in cotton output control. This is directly the result of Anglo Amer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y and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its evolvement.

Key words: Anglo-American cotton trade; price-setting gam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y

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性商品之一,棉花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美棉

花贸易对两国的国内政治经济政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突出者如英国的殖民政策和美国内战。但学界

收稿日期:2008-05-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8JC790098);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立项课题(08CGJJ008YBX)

作者简介:孙泽生(1975—),男,山西稷山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研究。

观察当时的棉花贸易和英美之政治经济政策演变多就事论事,未把棉花贸易、经济发展与英美的政治经济政策综合起来考察,无法看到源于英国并席卷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对棉花贸易的依赖以及棉花贸易对各国政治经济走势的重大影响,也无法为已成为资源性商品重要贸易国的中国提供历史借鉴。本文从新经济史学视角出发,试图把19世纪的英美政治经济政策演进与棉花贸易定价博弈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首先分析英美棉花贸易的演变,继而定量分析英美对棉花贸易定价权的争夺及其对两国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

1 19世纪的英美棉花贸易

英国棉纺织业的起源可追溯到1610年^[1]。但经过18世纪最后30年的迅速发展后,才扩展为英国工业中最大的一个行业^[2]。其发展是英国早期对毛纺织业保护政策的结果,东方贸易的发展和印度棉布的大量进入侵占了毛织品的部分国内市场,因而有传统优势地位的毛纺业者为抵制这种竞争,向国会请愿要求国家干预,于是,英国国会在1700年通过议案,严厉禁止由印度、波斯和中国输入棉布^[3],并12次增加对东印度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这一禁令使居民对英国棉布的需求大增,棉布价格上涨和棉布生产利润的增大促进了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成为工业革命的直接诱因。从此,棉布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占到英国全部出口的30%~40%,到20世纪初期还有约1/4的出口是棉布^[4]。

体现棉花重要性的是工业革命中心英国的资源状况。工业革命初期的棉纺织业主要消耗3种资源:煤炭、棉花和铁矿石,英国自身富有煤炭和铁矿石矿藏,所依赖进口者唯有棉花。其工厂用棉最初主要来自波斯、近东和地中海地区,但英国的巨大需求刺激了美国棉花生产的迅速扩大。美国一方面可利用西部垦殖迅速拓展植棉面积,同时美国南部的农场主也迅速从烟草等作物转产棉花;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压制劳动市场而获胜,种植园和奴隶制足以确保棉花种植者们免受激烈市场竞争中的运行风险。

到1820年,在英国的棉花进口中美棉已占第一位,占英国进口份额的74.7%^[2]。此后整个19世纪中,虽然在英国棉花进口中,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棉花数量常有变动,但美棉一直占据绝对优势,个别年份甚至达到85%之多。即使由于美国内战造成美棉生产遭受严重打击,出口锐减,但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英美棉花贸易又迅速恢复,1870年重又占到

48.06%的份额,1880年恢复到72.36%,达到美国内战前的水平。反观美国,棉花、小麦和烟草出口在1820—1860年占美国全部出口的70%以上,其中多为棉花。其棉花产量大部分用于出口,这一比例在整个19世纪稳定保持在6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高达90%;虽然美棉早在19世纪初即已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出口到英国的比重持续下降,但对英国市场的依赖一直非常明显,这一比重始终保持在50%以上。

因而,当时的英美棉花贸易呈现极明显的“双寡头”市场结构,棉花对英美两国均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以至美国内战爆发前,美国参议员、南部棉花种植园主詹姆斯·亨利在美国国会演讲称:我们无需开枪,也无须拔剑,我们就能把世界踩在脚下。这一点是确定的,英格兰将会一头栽倒在地,把除了南部之外的世界文明全部带走^[5]。经济史家Wright对英美棉花贸易的计量研究似乎证实了美国南部棉花天然的垄断能力。他认为,1830—1860年这一时期英国对棉花的需求弹性是非常低的,如果美国能控制其产出和出口量的话,美棉在世界市场上就拥有实在的垄断定价能力^[6]。但对同一时期英美棉花贸易条件的研究却显示,在19世纪前半期,英国棉花进口价格持续下降,虽然由于技术革新,棉纺织品出口价格也大幅下降,但棉布与棉花价格相比较的净贸易条件指数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只是在美国内战期间显著恶化,但随着内战的结束,又显著好转^[7]。以上论据所依的客观现实也是模棱两可的,既存在长期内的棉花价格下降趋势,无法用垄断能力进行解释,但又在年度之间出现明显的价格波动和上涨,且这一波动无法全部归于自然或技术的因素,最突出的是美国内战时期强制性的棉花减产和价格上涨,以至整个西方世界出现长期大范围的“棉花饥荒”,美棉“天然的垄断能力”又表露无疑。下文通过对1797—1896年英国利物浦棉花价格和美国纽约棉花价格的计量研究,可以确认英国在棉花定价中的优势要远较美国为大,为以上争论提供了更有力的新证据。

2 英美棉花贸易定价的计量及其解释

利用Hammond(1897)提供的1797—1896年英国利物浦棉花进口价格数据和美国纽约棉花出口价格数据来替代英国和美国的棉花价格数据^[8],并用米契尔提供的英美两国批发价格指数对其进行消胀处理^[9],同时引入North提供的大西洋海运费率

指数数据^[10]。对以上数据取自然对数,以尽量减少数据的波动,同时也可体现变量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用 LNFRT 表示运费率指数, LNPLVP 表示英国利物浦的棉花价格, LNPNY 表示美国纽约的棉花价格。运用 OLS 计量模型及 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来定量评估 19 世纪英美棉花定价博弈的结果,通过英美棉花价格的同向或逆向变动关系、运费率上涨时的成本转嫁能力及 Granger 因果检验 3 个指标来检验英美棉花贸易中的定价博弈结果。

2.1 OLS 模型

由于英美之间棉花贸易的高度相互依赖,同时考虑到预期对棉花价格的滞后影响(因滞后二阶及以上的变量的模型是不显著的,因而仅选择滞后一期变量进入模型),两国棉花价格关系可表述为以下 2 个模型:

$$\text{LNPNY} = c_1 * \text{LNPNY}(-1) + c_2 * \text{LNPLVP} + c_3 * \text{LNPLVP}(-1) + c_4 * \text{LNFRT} + c_5 \quad (1)$$

$$\text{LNPLVP} = c_1 * \text{LNPNY}(-1) + c_2 * \text{LNPNY} + c_3 * \text{LNPLVP}(-1) + c_4 * \text{LNFRT} + c_5 \quad (2)$$

其中, LNPLVP(-1) 和 LNPNY(-1) 分别表示英国和美国棉花价格的一阶滞后的对数值,系数 c_1 、 c_2 、 c_3 、 c_4 表示价格弹性。对以上模型的 OLS 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并使用 ADF 检验法检验残差项是否存在单位根。总体而言,模型的估计结果表现良好,拟合优度分别为 0.79 和 0.88,不存在一阶、二阶自相关和异方差,残差项也不存在单位根。

表 1 英美棉花定价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1 Regression result of Anglo American cotton trade pricing model

	美国价格 一阶滞后	英国 价格	英国价格 一阶滞后	美国 价格	运费率	常数
美国价格 (模型(1))	0.52 (8.69)	0.48 (7.87)	—	—	-0.20 (-5.71)	1.20 (6.71)
R^2	0.79		ADF	-9.97		
DW	2.04		Q	0.06		
F	116.26		White	1.85**		
英国价格 (模型(2))	-0.38 (-4.24)	—	0.65 (8.06)	0.59 (6.84)	0.15 (3.54)	-0.53 (-2.30)
R^2	0.88		ADF	-10.98		
DW	2.18		Q	1.14		
F	162.14		White	2.51*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 t 值,* 显著性水平为 5%,** 显著性水平为 10%,其余为 1%;英国价格一阶滞后对美国价格的影响不显著,因而在模型(1)中排除了这一变量。

回归结果表明:首先,当期的英美棉花价格间的正相关性很强,英国棉花价格增长 1%,可带动美国棉花价格上涨 0.48%;反过来,美国棉花价格上涨

1%可带动英国棉花价格上涨 0.59%。其次,英国价格的一阶滞后对美国价格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美国价格的一阶滞后与英国价格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最后,运费率与英国价格正相关,而与美国价格负相关,运费率上涨 1%,带来英国价格上涨 0.15% 和美国价格下降 0.20%,运费率变化对美国价格的影响相对更大。

2.2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OLS 模型已初步给出了英美定价博弈的主要结果,为判断其因果性,采用 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做进一步的推断。由于 Granger 因果检验必须基于平稳的数据序列,所以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其平稳性。本文采用 ADF 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美国价格和英国价格的对数值是平稳的 $I(0)$ 时间序列,运费率指数数据的一阶差分才是平稳的,即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 $I(1)$ 序列(表 2)。后文将该一阶差分与英美棉花贸易数据一起进行计量,因而 Granger 检验仍是基于平稳数据,同时一阶差分的经济含义是变量变化的速度,仍具有经济涵义,不明显影响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的可信性。

表 2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Table 2 Test result of data evenness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1% 的麦金农临界值	结论
ΔLNFRT	(N, N, 1)	-13.295 24	-2.588 772	平稳
LNPLVP	(C, T, 1)	-3.489 310	-3.455 842*	平稳
LNPNY	(C, N, 1)	-3.529 906	-3.497 727	平稳

注:检验形式(C, T, 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以检验式的随机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为标准;带*号的表示 5% 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 Δ 表示一阶差分。

其次,根据无约束(unrestricted)水平 VAR 模型来确定最优滞后期。根据 AIC 和 SC 最小的准则来选择最优滞后期,由于两者最小时对应的滞后期分别为 1 和 4,而对数似然估计值在 $p=4$ 时最大,可选取最优滞后期为 4(表 3)。对 VAR 模型的稳定性检验也证明,没有根在单位圆之外,VAR 模型满足稳定性要求。

表 3 确定 VAR 模型滞后期的各统计量值

Table 3 Statistic value of VAR model lag period

统计量	VAR(1)	VAR(4)
AIC 统计量	-0.061 872	-0.196 026
SC 统计量	0.044 976	0.157 993
LR 统计量	6.969 865	22.115 22

运费率数据取一阶差分,并设定最优滞后期为 $p=4$,利用多变量模型下的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来验证棉花定价的 Granger 因果关系,结果如表 4

所示。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显示:一是英国棉花价格变化是美国棉花价格变化的 Granger 原因,但美棉价格变化不是英国棉花价格变化的 Granger 原因,两者之间存在从英国棉花价格到美国棉花价格的单向因果关系,这表明英国的棉花价格变化引导美国的棉花价格变化;二是运费率与英国棉花价格的因果关系并不显著;三是美国价格是运费率变化的 Granger 原因,但同时运费率变化也是美国价格变化的 Granger 原因,运费率变化与美国棉花价格之间存在双向的 Granger 因果关系。

表4 英美棉花定价博弈的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

Table 4 Granger causality test of Anglo American cotton pricing model

零假设	F 统计值	结论
英国价格不是运费率变化的 Granger 原因	1.108 17	不拒绝
运费率变化不是英国价格的 Granger 原因	1.285 81	不拒绝
美国价格不是运费率变化的 Granger 原因	3.806 97	拒绝
运费率变化不是美国价格的 Granger 原因	2.703 10*	拒绝
美国价格不是英国价格的 Granger 原因	1.264 73	不拒绝
英国价格不是美国价格的 Granger 原因	4.829 69	拒绝

注:*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其余均为1%的显著性水平。

2.3 计量结果的解释

以上计量结果中,当期价格很强的正相关性证实了英美棉花贸易的相互依赖;但美国滞前一阶价格对英国当期价格的影响则出人意料,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意味着上期美国棉花价格上涨反而促使英国本期价格下降,唯一的解释在于其他棉花供给者以上期的棉花价格为依据扩大生产和出口,但由于棉花生产和出口存在时滞,因而形成了本期的廉价棉花供给,客观上削弱了美国的棉花贸易定价权。面对运费率上涨等外部冲击,英国相对美国具有更大的成本转嫁能力,因而英国也具有更大的棉花贸易定价权。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证实了英国在棉花定价中的优势地位:一方面,英国价格单向引导美国棉花价格的变动;另一方面,美国棉花价格的变动却与海运费率的变动负相关,形成双向的 Granger 因果关系,但英国棉花价格却与运费率变化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其解释是:一是由于美国很难控制棉花种植面积和棉花产量,英国对其殖民地棉花生产和出口的控制形成低价的棉花供给替代,殖民地棉花的替代性使其成为影响美国价格的重要参照系和美棉价格变动的竞争界(competitive fringe)^[11];二是英国海运业的优势并未表现在棉花定价上,这可能与海运业较强的竞争有关^[12]。但美国棉花价格的变动

却与海运费率的变动负相关,海运费率与美国棉花出口价格相结合只能保持在英国从殖民地所获得的垄断低价水平上,进一步证实了美国在棉花定价中的弱势和英国的优势。

3 棉花定价与英美的政治经济政策

3.1 棉花定价与英国的政治经济政策

由于棉花在英国工业中的核心地位,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寻找并扩大棉布的市场,二是获得稳定而廉价的棉花供给,两者互为前提、紧密相联。从这一角度可更清楚地阐释英国在19世纪的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既是英国夺取棉花定价权优势的成因,又是英国巩固棉花定价权优势的结果。

首先是棉花政策。由于英国早期的棉花主要从印度等地购得,英国棉纺业者首先要求破除东印度公司等垄断者的特权,以通过竞争促使棉花进口价格下降。结果在1813年,棉纺业者及其在英国议会的代表推动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法》,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但即使这样,印度等地的棉花也很难满足英国对棉花的需求,于是美棉进入了英国的视野,棉纺业者同样要求废止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对美国的贸易禁令。为此,1794年英美之间签订了《杰伊条约》,不受原《航海法》限制,给予美国利用英国船只从事西印度贸易的权利,大量进口美国棉花。美棉起初仅用以弥补印度等地棉花供给的不足,但英国商人很快发现,美棉的质量、包装和价格都要优于其他产地的棉花,结果使英国对美棉的消费迅速增长,以至于英国在1820年和1850年之间,它已不再是世界棉产区的一般附属物,而成为美国的一个特殊附属物了^[13]。这样形式上的依赖引起了英国棉纺业者的恐慌,因而早在美国内战爆发前的1857年,曼彻斯特棉纺业者推动成立了英国棉花供给协会,1860年曼切斯特商会组建了曼彻斯特棉花公司,其目标都是寻求更多的棉花供给来源,以避免对美棉的过度依赖^[11]。1902年又成立了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与殖民地政府合作在英帝国内寻找适宜的棉花产地并研究、试验和发展生产用棉的种植。在英国政府支持下,英国贸易委员会中专门成立了帝国棉花种植委员会,1920年还成立了帝国棉花种植公司以促进新棉花生产者进入市场。

其次是殖民政策。这一政策可分解为互相联系

的两个环节:一是开辟殖民地棉布市场,为英国的棉布寻找出路;二是促使殖民地生产棉花,以减弱对美国棉花的依赖,增强英国的棉花定价权。殖民地棉布市场开拓与棉花供给的扩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经济史家约翰森称其为“棉花帝国主义”——一方面制约和减少殖民地棉花消费者的棉花需求,不但粉碎当地的织布业,将原在当地纺织的棉花出口到英国,并驱使织布工人转而生产棉花,还可以英国的棉制品替代当地产品,反过来进一步激励棉花的生产和出口^[14];另一方面,英国还通过经济政策诱导和适当的超经济强制促使殖民地形成单一出口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由英国的贸易公司把持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权,来扩大殖民地的棉花生产和出口。如在英国布进入印度的早期,殖民当局就对英国布和印度布分别征收 5% 和 20% 的差别税率,此后随着英国布对印度市场的占领,又逐渐取消了过境税,以提高英国布的竞争力并促进印度棉花的出口。殖民者只有对国内贸易征税,才能更好地保护免税进口的制成品,而没有歧视性税收的话,英国货就不能同当地货进行竞争^[14]。但唯此尚不足以激励棉花生产和向英国的出口。以英国在埃及的政策为例,殖民者指令埃及政府紧缩开支,集中一切资金(包括举借外债)来发展农业,还采取削减粮食种植面积的方法来扩大棉花种植。同时,借口埃及缺乏燃料、技术和市场而不宜发展工业,指示必须停止一切妨碍或减少农业生产的措施^[15]。由此,殖民地的单一出口经济和可靠的替代成为英国夺取棉花贸易定价权的最重要依托。

再次是自由贸易政策。要保持棉花贸易的定价权,仅有对殖民地的控制是不够的,原因很简单,殖民地无法提供足够的棉花。即使在美国内战造成棉花价格飙涨的情况下,英国殖民地仍然无法生产足够的棉花,气候适合棉花生长的殖民地要么是如印度那样人均耕地不足,要么是如西非等地那样缺乏足够的劳动力。因而美棉仍是英国所需,但英国却无法控制其棉花出口。同时,由于保护贸易和进口替代,英国棉布出口到欧洲和美国的份额从 1820 年的 73% 下降到 1850 年的 43%,因而影响棉花贸易定价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尽可能延缓或制约他国棉纺工业的发展,以保持英国在与美国争夺定价权中的优势,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自由贸易政策。这样,英国可利用其在棉布等出口产品上的竞争优势,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市场,即通过取

消他国产品输英的限制,来换取他国取消英货入口的限制。甚至自由贸易者打的如意算盘是,一旦打入他国市场,就能阻止其工业发展,甚至冲垮它的工业以达到占领其市场的目的。更有甚者,“国旗跟着贸易走”,最后把他国或其他地区沦为殖民地^[16]。自由贸易政策的另一重要动机是充分利用英国在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优势,邓汉姆对 1860 年英法商约对法国棉纺业影响的研究发现,法国棉纺业者需要比英国同行多支付运费和佣金^[17],削弱了法国棉纺业的竞争力。

但英国争夺和巩固棉花贸易定价权的政治经济政策的作用依赖于其殖民政策和新兴国家的反应。为削弱美国的棉花定价权,英国通过各种政策激励殖民地的棉花生产和出口。但问题是:1) 新棉花生产者的培育费时费力,短期内难以完全替代美棉,在美国内战期间,英国设法从殖民地获得的棉花仅相当于 1860 和 1861 年进口量较大的 2 个季度的半数,虽然价格增加了一两倍,不列颠所使用的数量大为减少的棉花的 2/3 是印度的,仍无法从东方得到近于所需的数量^[13],英国在西非等地的殖民地棉花生产直到一战以后才逐渐形成规模;2) 即使印度等地棉花生产和出口快速增加,一旦美国内战结束,廉价的美棉重新进入市场,英国棉纺业者重又选择了美国棉花,英国对美棉的依赖又上升了,问题是已扩大的殖民地棉花生产反而激励了殖民地和新兴市场国家棉纺业的发展,他们迟早会成为英国棉布的竞争者。为此,英国殖民当局一方面取消英国棉布的进口税,另一方面为“公平竞争”起见,甚至对殖民地工厂生产的棉布征收“出厂税”^[18],这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不稳固的;3) 新兴市场国家为发展自身的棉纺业,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以抵消英国在棉布生产上的优势,19 世纪 70 年代后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棉花消费量逐渐赶超英国,英国的定价能力更明显地削弱了;4) 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新兴产业的涌现,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中心不再集中于棉纺业,因而美国也有可能通过产量限制等政策来改善其棉花定价能力,更打击了英国的棉花定价能力。即使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通过企业间的横向联合以及政府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干预,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棉纺织寡头企业,但棉花价格依然出现迅速上涨的局面,英国棉花贸易定价能力的弱化使公平贸易和保护贸易成为英国贸易政策的主要特征。

3.2 棉花定价与美国的政治经济政策

美棉生产在 19 世纪初的大规模扩张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直接相关,西部无限的土地供给赋予了美国先天的优势,但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棉花种植园所依赖的奴隶制本身。里佛利指出,奴隶制可以保护棉花种植者们免受激烈市场竞争中的运行风险,依赖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市场而不是被限制自由的奴隶对种植者们来讲都是一个不愿意承担的风险,也是一个可能妨碍美国棉花产量急剧增长的风险^[5]。西部垦殖和奴隶制使美棉产量在 19 世纪初的 10 年内增长了 25 倍,但也导致了美国在棉花定价上的劣势,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

美国棉花业最大的问题是在奴隶劳动上。对这一点,有远见的英国人在美国内战前就认为,某种可怕的灾祸迟早会无可避免地降临到兰开郡的棉纺织业身上;因为它的庞大上层建筑物一直是奠定在有限制的奴隶劳动这个不可靠的基础上^[13]。确实,奴隶制提供给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很强的成本优势以战胜印度等竞争者,但产量控制上的困难大大削弱了美国的棉花定价权。因而,定价中的被动强化了美国南部对奴隶劳动的依赖和对奴隶的压制。为诱导奴隶去完成与棉花生产有关的重复的、繁重的任务,农场主使用了包括激励、惩罚、监视在内的复杂的管理机制。种植园主利润的扩大仰赖于棉花种植园面积的扩大,这表现为对新加入联邦各州成为奴隶州的争夺,而种植园面积的扩大又需要奴隶数量的稳定和增长,包括设法获得新的奴隶来源、对既有奴隶投资的保护以及对逃亡奴隶的搜捕。但以棉纺业为代表的美国北方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好与此相反。面对国际竞争,南方需要的是自由贸易政策和棉花的扩大出口,自由贸易政策却不利于北方棉纺业者。北方棉纺业者的自然反应是推动政府通过保护关税制度来削弱英国在棉布等工业品中的优势,刺激北方棉纺业生产的扩大。同时,美国在棉花定价上的劣势部分源于产量控制上的困难,而产量控制又直接与美国南部棉花种植园的扩大相关。因而,争夺劳动力的使用既可为北方生产的扩张提供前提,还可削弱南方在产量控制上的困难局面,改善美国棉花定价上的劣势。这种相对立的利益诉求反映在美国的公共政策形成机制上,表现为南北方之间通过对新加入州是自由州还是奴隶州的争夺,进而争夺联邦控制权,控制参众两院、政府和最高法院,控制美国政治经济政策走向的斗争。

这一斗争首先在 1820 年的密苏里州加入联邦的问题上得以反映。美国国会通过的《密苏里妥协案》允许缅因州和密苏里州分别以自由州和奴隶州加入联邦,以使得南北双方在美国国会中的席位保持平衡。但随着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身份加入联邦,南北平衡重被打破,南方的反应是撕毁密苏里妥协案,在 1854 年推动国会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试图使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以奴隶州身份加入联邦,借而取得在美国国会的优势;同时作为南北方妥协的结果,国会通过了追捕逃奴的法令《缉奴法》,允许南部奴隶主在北部自由州搜捕逃亡奴隶,以保障棉花种植园的奴隶制生产方式^[19]。但 1858 年堪萨斯居民投票否决了奴隶制,并最终于内战前夕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以及堪萨斯州发生的奴隶主和自由移民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恶化了南北矛盾,成为美国内战的前奏。

另一个与棉花贸易定价相关的是关税政策。1816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部保护性的关税法,对棉织品和毛织品征收 25% 的关税。1828 年,美国国会立法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关税税率,将应税商品的平均税率升至 61.7%。但保护贸易和高关税引起南方种植园主的强烈反对,突出者如南卡罗来纳州甚至在 1828 年关税法通过后,在其州代表大会上宣布国会通过的关税法无效,声称如果联邦政府不采取强制措施,将脱离联邦,结果国会通过了降低关税税率及扩大免税商品种类的法案^[20]。但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在 1842 年成功恢复了类似于 1832 年那样的保护性关税税率,即所谓的“黑色关税”。毫无疑问,这部法案依然遭到南部奴隶主的强烈反对。当代表他们利益的民主党人执政时,1846 年沃克关税法便废除了“黑色关税”。但 1861 年莫里尔关税法的面世使美国重回到高关税老路上。针对关税率的斗争演变为,以南部种植园主为核心和以北部制造业集团为核心的两大派别之间围绕棉花贸易定价,而在关税、西部土地和奴隶州上的斗争,直接导致了美国内战的爆发。更关键的是,“奴隶劳动的不可靠性”直接导致了美国内战向有利于北方的方向发展,南部棉花种植园主所依托的奴隶制无可避免地失败了。

尽管内战消除了奴隶制,南部农场主依然发明了其他劳动市场体制来维持美棉的价格优势,这就是佃农制。依靠《作物留置权法》、《流浪法》和《劳工让渡法》,农场主通过契约安排和法律保障将佃农约

束在土地上,继续通过压制劳动市场维持和扩大美棉生产。但南北对立局面却不存在了,北方主导通过的高关税政策有效地激励了美国棉布的生产,现在这些棉布不仅需要广大的国内市场,而且需要充足的棉花供给,因而通过政府政策促进棉花生产反而成为必需。这与内战之前恰好相反。在自身棉纺业发展的带动下,美棉价格的长期下降趋势趋缓,甚至于随着新兴国家棉花消费量的迅猛增长,棉花价格在一定时期还出现了持续的上涨趋势。布哈林观察到,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美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使生产力有了蓬勃的发展……首先是美国,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工业,因而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大大改变了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以致数量上的变化已达到即将发生质变的程度,因此,农产品的缺乏,各地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成为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一种现象^[21]。随着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的涌现,棉纺产业不再具有先前的极端重要性了,这反而使得南部棉花种植者重又获得政治优势——20 世纪 30 年代的《农业调整法案》第一次引入了农产品价格支持和产量限制政策,迅速使美国在棉花等农产品贸易定价权上获得了优势,早前英国扮演的自由贸易旗手角色转移到了美国身上。

4 结 语

本文对 19 世纪英美棉花贸易的研究表明,虽然英美棉花贸易呈现明显的“双寡头”市场结构,两国之间存在极强的相互依赖性,但棉花定价能力是不等同的。利用 OLS 模型和 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计量结果表明,英国具有较强的棉花定价权优势,英国价格单向引导美国价格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对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强制和殖民地棉花的替代性供给,而非大多数研究所认为的航运业垄断,而美国居于定价权劣势的主要原因在于棉花产量控制上的困难。英美对于棉花定价权的争夺影响了其政治经济政策走向,是英美政治经济政策演变的最重要推动力;而这些政策又转而扩大或减弱了两国的棉花贸易定价权,以上定价结果也是英美政治经济政策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1]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M].杨人梗,陈希素,吴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2] 何顺果.美国“棉花王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3] 刘淑兰.英国产业革命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 [4] SANDBERG L G. Movements in the Quality of British Cotton Textile Exports, 1815—1913[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68, 28(1):1-27.
- [5] 皮厄特拉·里佛利. T 恤的全球之旅[M].肖建平,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 [6] WRIGHT G. An Econometric Study of Cotton Production and Trade, 1830—1860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1(2):111-120.
- [7] IMLAH A H. The terms of Trade of the United Kingdom, 1798—1913 [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50, 10(2):170-194.
- [8] HAMMOND M B. The Cotton Industry: An Essay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J].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897(1):3-382.
- [9] 米切尔.新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 [M].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 [10] NORTH D C. Ocean freight r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750—1913 [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58(18):537-555.
- [11] LOGAN F A. India-Britain's substitute for American cotton, 1861—1865 [J].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1958(4):472-480.
- [12] 吉尔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M].司徒淳,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 [13]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M].姚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14] JOHNSON M. Cotton imperialism in West Africa [J]. African Affairs, 1974(291):178-187.
- [15]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16] 蒋孟引.英国史[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17] DUNHAM A 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tton Industry in France and the Anglo-French Treaty of Commerce of 1860 [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28, 1(2):281-307.
- [18] 林承节.印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9] 特伦斯·M·汉弗莱.美洲史[M].王笑东,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
- [20] 杨少茂.美国史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 [21] 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M].蒯兆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